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 非传统收益^{*}

李向阳

在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中,东亚地区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其中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在“10+3”框架之下,东亚合作进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有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仍然没有实质性突破。依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模型的分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最有合作潜力的选择方案,并为各方所普遍认同。为什么会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仅靠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传统合作收益并不足以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而现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模型忽略了许多非传统收益。由于非传统收益具有公共产品特性,各方对待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存有分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供给不足现象。因而我们需要以更广的视角来看待区域合作的潜在收益,并促使各方对此形成共识,才可能真正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进展。

一、有关区域经济合作非传统收益的理论经验研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成本与收益)主要体现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近年来,以此为基础,人们开始扩展到对投资、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地说,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收益包括:贸易创造(或转移),贸易条件的改善,规模收益递增与竞争程度提高,刺激区域内和区域外投资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等等。估价区域贸易协定最常见的模型有两种,一是适用于事后评估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二是适用于事前模拟评估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近年来,由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开始加速,对不同合作方案模拟评估的研究越来越多。Gilbert等人(2001)分别运用引力模型和CGE模型对亚太地区不同类型的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模拟研究,至少在亚太地区,这两种模型所产生的结

果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九种自由贸易区协定方案:新加坡-日本、新加坡-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墨西哥、美洲自由贸易区、日本-韩国、中国-日本-韩国、东盟-中日韩、东盟-中日韩-澳新。其中“中日韩方案”是最有潜力的。此前,DeRosa(1998)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除此之外,中日韩三方经济学家的众多模拟研究也和上述结论相符。

但迄今为止,所有的理论模型均是对传统经济收益的量化,与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的大量非传统收益被排除在外。由此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过程中,与传统收益相比,非传统收益的作用越来越大。忽略非传统收益已经无法对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客观的解释。

第一,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经大大降低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保护程度已经降到了较低水平,通过区域化获取贸易投资自由化收益的潜在空间越来越小。因而,我们看到,尽管东亚地区尚不存在统一的区域贸易协定,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速度却保持了高速增长(表1)。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各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或者说,仅靠获取传统贸易投资收益已不足以刺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全面发展。在世界其它地区,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如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中东国家加入欧盟都不完全是为了获取纯粹的贸易投资收益。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对全球层次上的公共产品,而且对区域层次上的公共产品也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所谓国际层次上的公共产品是指所有国家“共享”的产品,它的收益并不单独归属于任何一国。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公共产品的交换行为难以自然产生,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的联系中断,虽然存在市场需求,但却没

^{*} 本文是2004年10月参加“东北亚合作与安全”会议(韩国大邱)提交的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作者感谢会议参加者所做的评论。

有市场供给。在一国之内,政府的介入可以解决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问题,然而在国际层次上不存在世界政府,只能依靠国际合作来完成。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度加强,对区域范围内的公共产品需求会逐渐增加,诸如提高共同的竞争力、环境保护、能源合作、政治合作,等等。对东亚地区而言,区域内国家政治、历史、经济发展的差异决定了对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增加。以往的区域经济合作参加者主要是小国。^[4]长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大国并不热衷于区域经济合作,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推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美加自由贸易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标志,美国开始致力于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也改变了原有的立场。大国战略的这种转变改变了传统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很多假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函数。按照新区域主义的分析,大国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甚至已不再是传统经济收益(李向阳,2003)。

显然,这些内容都不是传统经济收益所能涵盖的。尽管它们还难以在现有的区域贸易理论模型中予以量化,但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对此给予了大量的关注(Fernandez和Portes,1998;Schiff和Winter,1998,2002;World Bank,2000)。这些非传统收益大致可做下述分类:约束政府政策行为的时间不协调性(time inconsistency),向外部世界发出的信号效应(signaling),为小国提供的保险效应(insurance),提高成员国的交易能力(bargaining power),发挥协调机制的功能(coordination device),以及非经济收益,如输出民主观念,实施大国的全球和区域战略,化解纠纷等等。和传统收益相比,这些非传统收益具有更多的公共产品特性:正(或负)外部性、搭便车效应、收益和成本分配的不确定性。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并不打算完全借鉴上述对非传统收益的分类,而是针对东北亚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最为突出的几个非传统收益领域进行分析。在这些领域中,无论是解决矛盾、降低成本,还是创造条件、增加收益都必须依赖于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

二、东亚地区国际生产网络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在缺乏统一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前提下,东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区域性国际生产网络。当企业的垂直生产链条跨越国界时便形成了国际生产网络。因此,国际生产网络与跨国公司总是联系在一起。过去十年来,国际生产网络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主要分布于机械、电气、运输设备以及部分纺织工业。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网络主要集中三个地区: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之间、美国与墨西哥之间以及东亚地区。

与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呈现出下述特征:第一,它们构成了各个国家经济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贸易活动和国际生产网络密不可分。第二,网络涵盖不同收入水平的众多国家。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和比较优势被垂直生产链条充分利用。第三,网络既包括企业内的交易,也包括企

业间的市场交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形成了复杂的企业间联系(Ando, Kimura, 2003)。

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使东亚地区在原有的产品互补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区域内贸易推动力。在该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近年来机电产品贸易所占比例增长迅速,其主要推动力就是这种网络的形成。这和该地区对外国直接投资长期采取欢迎政策紧密相联的。

表1 东亚区域内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变化(%)

	1975	1985	1995	2001
东亚区域内贸易	1.0	2.2	6.1	6.5
东亚-日本贸易	1.4	1.8	2.3	2.3
东亚-中国贸易	n.a	0.3	0.8	1.3
东亚-世界其它地区贸易	4.4	7.2	10.2	12.1
NFTA区域内贸易	6.7	8.1	7.7	10.1
欧盟15国区域内贸易	24.1	21.1	22.7	20.2
南方共同市场区域内贸易	0.1	0.1	0.3	0.3
东盟区域内贸易	0.3	0.6	1.3	1.2

注释:表中的“东亚国家”不包括日本。

资料来源:Ng; Yeats(2003),第3页。

从表1可以看到,近年来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很快,不仅超过了与传统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与日本、东盟内部),而且也超过了多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增长速度。其中,与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最为显著,由此改变了该地区原有的贸易模式。在东亚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分工模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盟从高到低处于不同的分工链条上,但最终都向中国出口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中国则承担着最终组装的工序,并向欧美市场出口。

表2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收支差额的地区分布(前十位)

单位:亿美元、%

排序	顺差国	金额	增长率	逆差国	金额	增长率
1	中国香港	890.8	36.8	中国台湾	-512.3	26.9
2	美国	802.7	36.9	日本	-344.3	49.4
3	荷兰	155.5	34.5	韩国	-208.6	41.9
4	英国	102.1	40.8	马来西亚	-100.9	28.5
5	阿联酋	55.4	29.8	德国	-66.1	-3.5
6	西班牙	37.3	47.5	泰国	-57.4	14.9
7	墨西哥	28.3	78.1	巴西	-50.1	35.3
8	意大利	27.7	76.5	菲律宾	-47.9	49.0
9	比利时	23.4	100.7	沙特阿拉伯	-47.5	57.0
10	法国	22.6	88.4	安哥拉	-45.2	119.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

由于中国正在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产品最终装配基地,该地区许多国家原本对欧美市场的部分出口转化为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中国对周边国家(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见表2)。^[3]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承担了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压力。

这一点也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生产网络与其它两个地区国际生产网络的最重要区别。在其它两个网络中,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是网络内的国家(德国与美国),况且都有区域贸易协定作支撑。而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最终消费市场是欧洲与美国。鉴于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以国际生产网络为基础的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格局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不会因短期的贸易政策而改变。但如何缓解中国对其它地区的贸易不平衡压力已经不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东亚地区国家,尤其是中日韩,需要共同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缓解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东亚和东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

表面看来,解决东亚国际市场网络这种两难困境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即缓解中国对美欧市场的高度依赖与贸易顺差。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符合东亚所有国家(地区)利益的。目前围绕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这种失衡突出表现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以至于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2004年美国经常帐户逆差/GDP达到了创纪录的6%。短期内美国之所以还能够忍受经常帐户赤字的不断增长,源于亚洲国家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又重新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弥补了美国国内储蓄投资缺口。多年来,美国与东亚地区的这种循环一直是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机制,但现在这个循环的链条已经出现了裂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降低美元的储备,从而对美元汇率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持有巨额美元储备,东亚国家中央银行却不能轻易宣布降低美元的持有。同时,为了防止本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东亚国家中央银行又不得不大量购入美元,结果是货币政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方式,各方的立场差异很大(Obstfeld和Rogoff,2005)。然而,无论是外部世界的被动调整,还是美国国内的主动性调整,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乃至东亚国家经济发展都将会出现难以为继的结局。

在更长时期内,摆脱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两难困境”的根本出路是该地区经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减少对区域外市场的依存度。因此,加强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项必然的选择。

三、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国际经济格局

区域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收益是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提高成员国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越来越不可能完全主导规则的制定过程。鉴于此,各国之间在规则制定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求助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国际经济的基本格局是美日欧三足鼎立。随后,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双方所基于的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当1986年欧共体决定与欧洲自由贸易区

合并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时,美国随之与加拿大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当欧盟1992年签署《欧洲统一法》时,美加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扩展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在积极开展“东扩”的同时,美国也在致力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到2004年,欧盟“东扩”完成接纳首批10个新成员国之际,也是美洲自由贸易区原定的谈判结束之时。^[4]

除了各自完成上述扩张外,美欧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争夺也不断加剧。欧盟已经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与地中海国家、中东欧国家、南非、墨西哥、智利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通过2000年的“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s),欧盟将用自由贸易区协定替代原有的“洛美协定”。而美国与以色列、约旦、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新西兰、东盟、非洲国家和地区之间已经或正在商谈缔结自由贸易区协议。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基于其中东战略提出了2013年与中东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而在此之前,欧盟已经决定在2010年与这些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

至此,以美欧为核心新的世界经济两强格局已逐渐形成。相比之下,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大国——日本则一直停留在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之外。进入21世纪后,日本正在加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但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决定格局的大环境下,世界经济的第三极能否形成,它的基础是什么?对此,我们还无法做出确定性的判断。理由是,日本还没有把东北亚和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未来世界经济第三极的基础。它迄今所推行的策略仍然是力图围绕自己签订双边的区域贸易协定和跨区域贸易协定(如与智利、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充当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轮轴”(hub)。

且不说把中国排除在外能否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第三极,即使是日本最终完成了与区域内多数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能够与美洲、欧洲两大集团相抗衡的第三极也难以出现。美国拥有与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签署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能力,但它仍然寻求整个区域内的合作。离开这一点,它将失去与扩大的欧盟相抗衡的能力。如果东亚的大国不选择相互合作,该地区将最终形成以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为主导的格局。因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东亚国家整体被边缘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就单个国家而言,规则制定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成本是极为明显的,但整个区域被边缘化的成本似乎不关任何国家的利益。在这里,大国与小国之间在收益分配(或成本分摊)存在着不对称性:小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原本就比较小,参与到一个区域贸易集团会扩大其影响力,但同时要取决于它在区域集团内的地位。仅就这项收益来讲,小国参加本区域的贸易集团还是参加跨区域的贸易集团差异不大。对大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失去本区域的贸易集团作支撑,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按理说,该地区的大国应该更积极推进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但对未来区域贸易集团内主导权的分配存有担心,不论是该地区的小国还是大国都在商谈、签署双边或跨区域的区域贸易协定。

世界经济能否形成以东亚合作为基础的第三极,重新确立新的三足鼎立(欧洲、美洲和东亚)将取决于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尤

其是中日韩三个大国之间能否走到一起。

四、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的空间

保障稳定的外部石油供应对中日韩三国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过去一年间,世界石油价格的急速上涨再次为各国的石油安全敲响了警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越来越高,2000年石油进口量已超过5000万吨,2004年石油进口的数量已经达到1.2亿吨,占国内消费量的32%,预计2010年将超过50%。因此,中国越来越重视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安全问题。

日本和韩国的石油供给主要依赖于外部进口。虽然日韩两国均是国际能源署(IEA)的成员,国内能源安全体系的建设已趋于成熟,但面对日益严峻的石油供给形势,三国开展能源合作的空间仍然非常巨大。

第一,协调立场,获取新的石油供给来源。目前,俄罗斯是中东地区之外石油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国家。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并且紧靠东北亚三国。作为东亚最大的石油需求者,中日韩三国在协调对俄罗斯油气供应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从2003年开始的中日对俄罗斯的输油管道之争,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外,日本与中国在获取中亚、中东、非洲的石油供应方面也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不合作的代价将必然是双损的结局。

第二,提高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交易能力。东北亚地区能源联系与合作远远落后于欧美,进口油源单一,石油市场脆弱,自1992年起亚洲的石油价格就高出欧美1—1.5美元/桶,而且目前已扩展到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等领域。亚洲原油“溢价”的存在,使亚洲石油消费国每年向石油生产国多支付50亿至100亿美元(赵宏图,2005)。另一方面,中日韩三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和进口总量都已接近美国,超过欧盟,位居世界第二,因而也完全有能力发挥其大买主的交易能力优势。

第三,合作保障东北亚国家共同的石油运输线。中日韩的石油进口主要都依赖于中东地区,途经马六甲海峡有着遥远的运输线。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政治局势,马六甲海峡接近饱和的通航能力和频繁的海盗出没共同威胁着东北亚三国的石油供应。在维护石油运输线安全和开辟新的运输线方面,中日韩三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第四,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和毗邻的地理优势为三国建立共同的石油储备创造了条件。石油战略储备是能源安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保障石油稳定供给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耗费巨大的投资工程。因此,如何提高石油储备的功效,降低储备成本是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欧盟国家通过合作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石油是一种政治敏感性极高的特殊商品,无论是获得稳定的外部石油供给还是建立共同的石油储备体系都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因而基本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政治上相互信任和具有固定的合作组织形式。

五、东北亚区域环境保护的合作空间

环境保护既需要一国政府的努力,也需要全球和区域层次上

的合作。在全球层次上,以《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在区域层次上,围绕跨国河流、湖泊、森林等所签署的环境保护协定也在不断增加。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多哈谈判议程涉及到了“贸易与环境”条款,而实际上许多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涵盖并实施了类似条款。这表明,区域贸易协定对区域内环境保护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日韩三国地理上的毗邻决定了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合作有着巨大的空间。在这个领域,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国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对整个区域内环境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虽然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为此确立了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要短时期达到日韩的环境保护水准是难以做到的。

在保护东北亚区域环境问题上,中日韩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既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客观上也在维护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利益,诸如治理大气污染、酸雨和风沙等等。其中,对风沙的治理还超越了中日韩三国的范围。每年春季席卷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主要来自于蒙古高原,并威胁到韩国与日本。中日韩三国如何携手帮助蒙古从根本上控制沙尘暴的源头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2005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讨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发展格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的大国已经成为《京都议定书》签署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与非签署国(美国、澳大利亚)争夺的焦点。如果在东北亚区域层次上都无法取得共识,那么很难要求中国放弃自身利益站在《京都议定书》签署国一方。

六、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化解政治、历史、外交纠纷

区域经济合作对于化解成员国之间的非经济纠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Schiff和Winter,2002;World Bank,2000)。历史上,欧盟的起源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近年来,最为典型的要属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中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巴阿之间的关系曾经一直不融洽,长期处于军备竞赛状态,甚至一度有军事冲突的危险。1986年两国签署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计划”(PICAB)大大缓解了相互间的不信任。正是这项合作计划为1991年的南方共同市场奠定了基础。

东北亚和整个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阻力就来自于历史与政治纠纷,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互不信任。反过来,合作无法取得进展又加剧了相互不信任。如何打开这一“死结”,既需要各方创造合作的环境,又需要政治家在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果断决策。

在现实问题中,东北亚的合作对于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朝鲜半岛的对立是危及地区安全的第一个来源。无论是解决目前的朝鲜核问题,还是半岛的最终统一都和中日韩三方密切相关。加快东北亚的合作步伐将为半岛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

危及该地区安全的另一个来源是台独所引发的台海冲突。台独势力试图寻求外部支持的力量主要来自美国,但在东亚地区,日

本的右翼势力也在成为台独寻求的一股外部力量。如何抑止台独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突出问题。

因此,区域经济合作对于解决历史纠纷、朝鲜半岛统一、台湾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仅仅依靠传统贸易、投资收益无法全面推动东北亚(及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下,加强开发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应该得到各方的充分认同。从这种意义上说,能否对区域经济合作非传统收益取得认同已经成为影响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而推动这一进程将更多取决于各方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的认同感。当然,最终要取决于政治决策。

注释:

[1] 欧洲经济共同体产生的背景比较复杂,但其成员和美国、日本相比也可算小国。

[2] 香港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转口地,其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第一大来源地本身并不说明真实的贸易往来。

[3] 由于美国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等领域的分歧,美洲自由贸易区没有在预订的时间内完成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
- 2.赵宏图:《东北亚能源合作前景广阔》,载《参考消息特刊》,2005年1月14日。
- 3.Schiff ,M. and L.A. Winter :《区域一体化与发展》,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
- 4.Ando, M., F.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167, 2003.

5.DeRosa, D.A. (1998),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Statistic Economic Theory, Quantitative Findings, and Policy Guidelin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6.Fernandez, R. and J.Portos(1998) , Returns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2, pp. 197- 220.

7.Gilbert,J., et al (2001) , Assessing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Policy Issu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odities Studies No.15. UNCTD.

8.Ng, F.;A. Yeats (2003) , 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 What Are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3084. World Bank.

9.Obstfeld, M. and K. Rogoff (2005),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 <http://post.economics.harvard.edu/faculty/rogoff/rogoff.html>

10.Schiff ,M. and L.A. Winter(1998) ,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2, pp.271- 295.

11.World Bank (2000) , Trade Blocs. World Bank.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